



人大重阳论坛实录

第十三期

马丁·李斯：

21世纪新条件下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一所现代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金融学家陈雨露教授任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立足人大，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为宗旨，力求为国家发展培养和输送高级金融人才，立志打造一个以“大金融”研究与传播为核心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智库，最终实现金融报国、知识报国的宏愿。



主讲嘉宾：马丁·李斯
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世界安全大会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



主持人：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特邀嘉宾：陈先奎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特邀嘉宾：马国书
广东供应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



特邀嘉宾：文佳筠
美国 NGO 组织全球化国际论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



特邀嘉宾：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欧学术连线主任



特邀嘉宾：弗莱德·杜比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特别顾问、华大基因高级顾问



特邀嘉宾：奥特曼·西门斯
世界银行原欧洲地区副行长

重陽論壇實錄

重陽論壇

王文：

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领导，下午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享有世界声誉的国际政要马丁·李斯先生来到人大重阳演讲。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马丁·李斯先生原来是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和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同时他还对中国的环保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今天我们还要在马丁·李斯先生的头衔下加一个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是我们聘请的第三位国际高级研究员。此外，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其它几位嘉宾，他们是：

克里斯汀娜·李斯，马丁·李斯的妻子

弗莱德·杜比，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特别顾问、华大基因高级顾问

奥特曼·西门斯，世界银行原欧洲地区副行长

还有今天几位高级研究员和著名教授，他们分别是：

马国书，广东供应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

文佳筠，美国 NGO 组织全球化国际论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

陈先奎，中国人民大学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授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欧学术连线主任

下面就请马丁·李斯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马丁·李斯：

非常感谢大家，下午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再次被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在座的诸位都是非常著名、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我希望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机就

中国未来的发展做一次演讲。

我在 1980 年 3 月份第一次来到中国，中国在这 30 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寿命、安全，以及中国人未来的目标。而刚刚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定，已经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建立了新的道路，因为创新性、竞争性、可持续的经济，为安定团结的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此次演讲当中，我将会描述当前世界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世界经济在 21 世纪上半叶的稳定性和表现。之后我会探讨这些问题和中国的未来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其次我将简要介绍一下如何将我们现在的发展轨道引导向安全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最后我将进行总结，为中国持续的发展以及转型提供几点建议。

未来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和世界的通力合作

在当今社会，人类活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整个地球所能承载的范围，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这些因素决定着未来发展的稳定性以及世界经济的走向。现在人类的活动已经影响到世界的环境、生态系统，这使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世界人口将达到 90 亿，中产阶级不断增加，消费也会随之增加，同时资源的竞争也会不断的加剧，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也是空前的强大。如





果现在还不采取纠正型的措施，还继续保持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的经济会出现过度的增长，甚至是崩溃。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力量，它经济总量占世界的第二位，但是从人均的 GDP 来说只占 120 位，从人均发展指数来说排在 101 位。继续发展经济固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不能因为短暂的发展而牺牲了长期的利益。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必须找到一条经济转型的道路，这样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会进一步提高。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修改新的发展思路，退出新的增长模式、新的就业和全球化的政策，这样我们才能在

长期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这些领域有一些有价值的想法和经验可供借鉴，因为现在中外之间进行的是双向交流，中国和外国都要向双方学习。

在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中，我想先介绍一下人口问题。各种经验表明，人口的发展轨道是可以受政策控制的，比如说消除贫困、加强教育、授权于妇女，这些政策都能够改变人口的增长模式，所以把人口控制在大约 85 亿，而不是让它增加到 90 亿或者 100 亿是非常关键的，这是我们现在主要的全球政策之一，但还未引起高度关注。

到了 2030 年，全世界大约有 10 亿的中产阶级，这将会对环

境、资源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根据购买力评价计算，当前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 66 万亿，然而在这样的社会里，却有超过 10 亿的人还生活在极度的贫困和饥饿当中，又有另外 10 亿的人还不能获得充分的营养。

现在世界人口结构正在变化，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国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现在老龄化人口增长特别快，1982 年老龄化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5%，而在 1999 年上升到了 10%，目前正在以每十年增长 1 亿的速度不断提高。与此相对的是，现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型城市，依然有大量的无业青



年依然生活在贫穷当中，他们生活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的小城市，以及巴黎、伦敦的城郊。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非常的普遍，这影响到社会的凝聚力、政治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现在就业问题的重要性绝不次于经济发展问题，我们需要为年轻人提供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

21 世纪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而同时又维护一个稳定和健康的生态环境。我们已经把生态环境逼到了不稳定的边缘，根据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的数据表示，现在有 2 万种动植物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这是 4.5 亿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生物灭绝。人类对生物资源的使用已经超过生物再生能力的 50%。如果人们都想达到美国那样的生活水平，那么全球将需要 5 个地球的生态资源才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水资源、淡水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紧张，因为污染过度使用和管理不当等问题，每 20 年水资源的使用量就会翻一番，水资源对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有全世界 20% 的人口，却只有 7% 的水资源。在过去的 30 年，我们对海洋的破坏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加起来的总和。平均海洋酸度在过去的 200 年间增加了 30%。我们目前对环境的破坏如此的严重，又怎么会有信心在 2030 年实现全球经济翻一番并维持指数型增长呢？

下面我想讲讲至关重要的气候变化的问题。地球正在变暖，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干旱、火灾、沙漠化等，还有极端天气气候。而上述各种灾难仅仅是因为从 1950 年工业化以来，气温上升了 0.8 摄氏度。我们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努力将气候温度上升限制在 2 摄氏度之内，他们认为这样地球就会比较稳定。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把温室气体限制在 450PPM，但是我们实际上正在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如果坚持既定的发展模式，全球温度将在 2110 年上升超过 6 摄氏度，这甚至是比政府间框架协议预测的最糟情况更糟。我们正处在非常危机的时刻，而中国的行动将会决定我们的未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平问题，过去工业化国家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而现在，虽然中国人均排放量比较低，仅人均排放 7 吨的二氧化碳，但是鉴于中国的人口数量和经济模式，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中国的发展是以廉价的能源为基础的，但是这个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们想保证到时候全球有 90 亿人都享有比较好的生活，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那时候的能源产出必须翻一番。我们不仅要在 2050 年实现能源产出翻一番，也要在那个时候实现减排 50%--80%，而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中国现在已经成功减少了能源密

集度，已经降低了 19.1%，这是在“十二五”期间取得的成就。

下面我简要讲一下经济和金融问题。现在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世界上 2% 的高端人群享受 50% 的财富，而 50% 的低端人群才享有 1% 的财富。20 国集团领导所预测的是世界经济将在 2030 年实现翻一番，同时在 2050 年又会再翻一番，有人可能会认为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但是考虑到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它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全球问题的治理需要新的转变

我们需要新的治理以及合作模式，这样才能解决这些相互联系的全球挑战。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我们需要连贯完整的政策；它们处于快速和动态的变化当中，因此我们需要灵活性和弹性；这些问题是系统性和非线性的，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模式和策略；它们是全球性的，因此我们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同时它们是危险和高风险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紧急的合作。

而我们的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呢？我想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的想法落后于现实，我们想采用短期的方法解决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

第二，我们的政策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

第三，我们的经济模式导致

了无止境的消费驱动性增长，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没有解决失业、贫穷等问题。

第四，在观念、价值观上没有进行改变，没有认识到这些危险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第五，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阻挠改变。

当前经济增长模式还有以下的缺点：

第一，我们过渡强调消费和GDP增长，以GDP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第二，我们并没有考虑外部的效应，比如社会后果和生态环境。

第三，我们没有正确地估计公共物品的价值，比如海洋、河流、冰川、大气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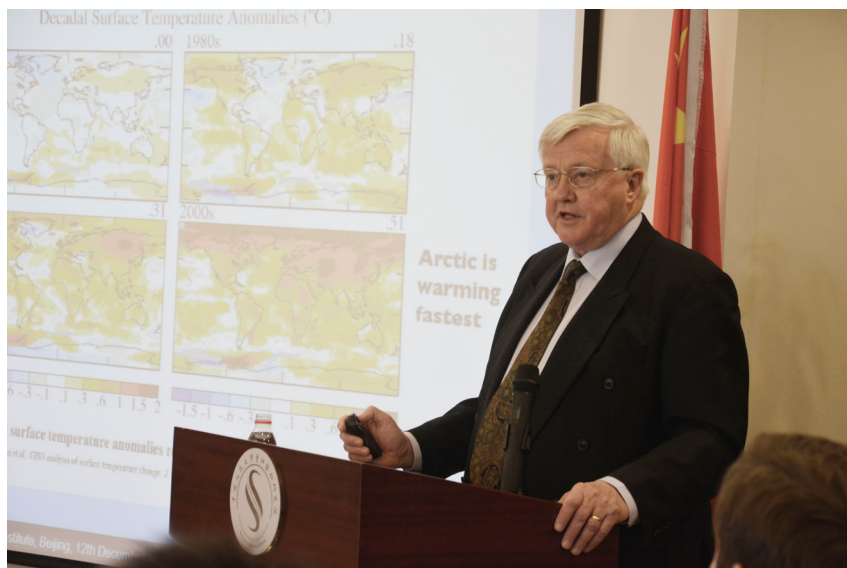
第四，我们过度看重短期效应，却忽视了未来几代人的利益。

第五，我们对脱贫社会包容性和公平的重视不足。

第六，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是互相联系，是系统性的。

现在国际社会所需要的是研究实验和创新性的政策，从而建立一个稳定、不断发展的社会。接下来我将从5个方面简要介绍我们需要进行的转变，我希望大家在之后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我们要实现价值观和行为的转变，我们现在的增长不能依靠于那种认为我们的经济必须要不断的刺激消费，并且把每个人都



视为消费者的传统观念。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来找到新的发展路径，要侧重质量而不是数量，要实现真正的增长，实现资源的有效性、包容性，社会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第二，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战略，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的共同发展。

第三，经济转型，我们需要实现政府和市场角色之间的平衡，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有效性，增强我们的创新力和活力。

第四，上述几点如果仅靠政府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动员社会力量。

第五，要转变和更新我们现在的治理制度和模式，依靠20世纪的理念来治理21世纪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中国需要推进这五项转变，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发

展，需要和世界进行整合，如果仅靠国内政策，没有国外的支持，中国的这种改革也许不能成功。同时，中国还要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人口需求，这样才能保持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稳定的气候，以及和平的世界。

感谢大家的认真听讲！

现场点评和提问

王文：

非常感谢马丁·李斯同事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增强了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类发展的危机感。接下来我们有请嘉宾进行点评。

陈先奎：

谢谢马丁·李斯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国际排放的重要信息，这对中国很有参照意义。希望马丁·李斯先生利用以后在中国的时间，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环境

和排放方面所出现的新情况。

第一，在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的政府主动性有所提高。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国际上的朋友和马丁·李斯先生的注意和重视。

第二，中国的企业也在做出很大的努力。据我的了解，经过我国电力系统五大公司的努力，我们风力发电的总量和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我们的中石油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都在使用天然气进行稠油加热，尽管代价很大、效益不好，但是为了解决排放的问题，我们整个石油的系统全部采用了这个措施。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学者，我希望国际上的朋友能够动员美国页岩气开采技术能够更好的向更多的国家开放，用新能源技术来为改善排放效果做出贡献。

最后，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念，就是小康生活。我相信和西方的丰

裕社会相比，小康社会的观念应该排放更少一些。希望我们的小康生活能够得到西方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弗莱德·杜比：

首先非常感谢李斯先生。其实中国为了实现这5个转型所做出的行动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其次，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像我们前几天所乘坐的高铁，它的向前动力很强，让这种巨大的力量停下来是很难想象的。最后，普通人民的参与也会改变转型。你所描述的这些确实是对人类发展影响甚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现在看来还有点难度。

马国书：

首先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人大重阳的大家庭。在全球发生大变局的时代，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当然比思想更重要的是新思想，比

思想和新思想更重要的是独立思想，比前三者更重要的是有实践技术的独立思想。把前四个加在一起，能够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的思想就尤为重要。所以马丁·李斯先生刚才的演讲使我受益匪浅。下面我想就您刚刚的发言做几点评述：

第一，环境的增长一直是今天人类共同探讨的最核心的问题，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它是内增性的。生产和消费相符合的制度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没有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没有实现，所以人类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制度可能还有待讨论。因此我们不可避免要面临着增长的问题。

第二，保护环境和自由市场精神之间正在发生根本的冲突。只要是保护环境就一定要超越自由市场的精神，一定要有政府为先导的基本界定。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思考自由市场的局限性，以及西方所采取的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存在新的可





能性。

第三，今天马丁·李斯先生在谈论环境保护问题时还是采用了道德伦理的方式。我们还找不到有效的实施路径和策略，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明确我们是采取人类中心论还是地球中心论。

我们现在认识到全球的问题一定由全球的体系来做，可是今天以主权为体系构造的联合国体系，已经对治理全球造成了重大的制约。我们都在反对 GDP，但是 GDP 本身没有错误，关键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经济学所依赖的交换原理体系已经陈旧了。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能超越整个现有的旧的体系，我们看到的世界将是和今天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充满光明的世界。

奥特曼·西门斯：

其实我觉得马丁·李斯从金融角度分析这些问题是正确的，因

为它确实在这个问题的形成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在中国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未来会遇到的一些难题和问题。现在在我们经济体制内造成的浪费现象正是影响环保问题的根源。未来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谦虚，更尊重生命的视角来认识我们的发展模式。

文佳筠：

我是《罗马俱乐部》的忠实读者，我赞同马丁先生所说的每一句话，正因为如此，我下面将要更坦率地和马丁先生分享我自己在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现在西方社会常常是在强迫中国也重复他们的错误，中国2000—2005年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曾经对德国一位政治家说过，如果你们真的希望中国低碳的话，你们所有试图向中国推销汽车的人都

应该回家去，我们中国可以继续骑自行车。但是这位德国政治家说那不行，中国人还是应该买我们的车，但是他们每周只能开一次。2011年，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广告公司的采访时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采取澳大利亚或者美国的生活方式的话，这个地球是承受不了的，所以中国政府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方式，这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奥巴马没有提到，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也同样需要改进。

王义桅：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宁可相信马丁·李斯先生说的是事实，尽管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首先，中国已经做得更好了，但是你还要拿着鞭子抽打它，驱动它，像美国，反而没有人抽它。其次，马丁·李斯先生主要考虑到生





产方式要调整，但是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思想方式，这些也要提出来。中国一定会善于利用这样的挑战，但是目前我们也面临三大悖论：

第一，中国是后来者，常常在掌握了规则之后又遇到规则的更改。中国现在刚刚实现现代化，甚至还没有实现，国际上就说要超越现代化。

第二，让中国负责任的同时也要给中国相应的权力。比如诺贝尔奖从来没有颁给我们的领导人，以此鼓励他们继续作出贡献。

第三，国际上在承认中国的贡献的同时，也要承认中国的价值。

马丁·李斯：

我先用一些引言阐述我的观点。

第一，老布什有一次在环保谈判当中曾经提出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在桌子上，是不能谈判的，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第二，美国印第安人酋长的引言是“白人能够创造出非常灿烂、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怎么分享这些好的东西。”

第三个是经济学人杂志所提出的，当美国消费没有办法维持全球经济增长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评论，说中国消费者应该模仿西方人买一些你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最后一个引言来自凯恩斯，

他不让我们高估经济学的重要性，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其它更有价值、更有重大意义的东西。非常感谢大家！

王文：

谢谢大家！



网址：<http://rdcy-sf.ruc.edu.cn>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文化大厦6层

Add:6th.Floor,Wenhua Building No.59 Zhongguancun Street,Haidian District,Beijing 100872 P.R.China